



概供施政參攷
請勿公開發表

敵偽研究

7

第七期 三十一年四月一日出版

論日寇的「軍票政策」

偽「東亞聯盟運動」之本質

—附參考資料—

東亞聯盟運動之展開

關於東亞聯盟運動

偽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會章

偽東亞聯盟中國總會重要職員

敵「強化」汪偽之檢討

—附參考資料—

敵交還粵津英租界聲明
偽地方會議之意義



浙西民族文化館敵偽研究室編印

通訊處 浙江天目山



論日寇的「軍票政策」

敵人所施行的「軍票政策」並非始於今日，在日本歷史上以明治十年的西南戰役中發行的軍票為最早，以後甲午中日戰爭，投機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強佔西伯利亞，均有軍票流通。但是目前敵人使用的軍票它和單純的作為發給手袋的軍票，顯有不同之處，即現今之軍票，敵軍部正極力設法支持其價格，以期培養如普通國內通貨之資格及機能。自太平洋戰事爆發以後，上海淪陷，敵人這個企圖，更為明顯，大有欲藉此以排斥法幣於華中華南淪陷區內之流通，繼而代之勢。

自敵人廿六年十月，浙西之在抗州灣登陸後，便開始強迫使用軍票，至翌年十一月乃大量印發，於是便氾濫於我華中華南一帶，這種氾濫敵人稱為「強化軍票」工作的成功！

敵人「強化軍票」的動機，實由於當時在華之日圓價格跌落而來的，因而關於日圓跌價的情形我們在這里首先有一提的必要。

關於日圓在上海價格的跌落，主要是因為在華之日圓紙幣，與其在敵國內之圓紙幣在性質上有所不同，因前者是脫離了其國內「外匯政策」壓束的放任性的紙幣，此其一。

造成第二個日圓跌價的原因：是因為氾濫於華中一帶的日圓，較以日圓紙幣所能買得的商品或勞役有相當的過剩。本來一般貨幣或通貨的價值，在它所能買得的商品與勞役多時，價格便增高，其所能買得的商品與勞役少時。即為膨脹而價格低落。用日圓紙幣所能買得的僅是敵人佔領區內的商品和敵軍統制下的若干物資和勞力，同時因為敵人在華戰區擴大，日幣的供應非常沒有限制，在初期敵軍以日圓為軍事支付不斷的支出外，尚有自其本國移來的事業費與旅行費等等，加上廿七年華北「聯銀」成立之初，偽「聯銀券」因缺乏信用，致使華北偽鈔大跌。又因「聯銀券」與日圓有結托關係，使日圓在華北的價值也連帶跌落，因華北日圓跌價，而上海那時日圓市價，較華北稍高，故一班投機商人，利用兩地的差額，就在華北將「聯銀券」換成日圓，把日圓運至上海換成法幣，再將法幣運至華北，如此循環牟利，遂促成上海日圓充斥，匯價大跌。估計在廿七年八月間上海日圓的流通額達四千萬至五千萬圓之巨，因而對於供給該項日幣的商品勞力顯有不足，於是造成了日幣價格的低落。這種情形自從二十七年春季

以來一直繼續着，就是到統一使用軍票後，也沒有根本的改善，我們可用一個例子來證明：下面便是統一使用軍票以後，去年二月八日的一例：

日幣 1 圓在國內 = 英國貨幣 $14\frac{1}{2}$ 便士。

同日法幣 1 元 = 英國貨幣 $3\frac{2}{10}$ 便士。

故法幣 1 元 = $1 \times \frac{3\frac{2}{10}}{14\frac{1}{2}} = 0.2198$ 日圓

但同日上海銀行行情法幣 100 元 = $50\frac{2}{3}$ 日圓

因而實際日幣 1 圓對英國貨幣 = $3\frac{1}{10} \times \frac{100}{50\frac{2}{3}} = 5.8$ 便士。

我們照上面這個例子看，在去年二月八日的那一天，日幣一圓在上海只值別英鎊五·八便士，與同日其國內行情相差竟達八·七便士之巨。

敵人爲了要增進輸出，藉以護得購買戰爭器材的外幣計，故在敵國內極力維持着較高的匯率，同時還努力着現金集中的工作，然而上海的這種情形，使非十四便士不能買到一圓日幣的情形，在上海只要五·八便士就可能購得一圓日幣（這是照例子的推算，並非實際市價）在這影響之下，使日本輪向第三國貨物的款項，都用在上海所買的賤價日幣來支付，敵人在防止日幣跌價的對策中，就決定以增發軍票收回氾濫的日幣，藉以代替日圓之直接膨脹，同時以此替代日圓在華淪陷區內的職能。

於是凡自日本赴華中時攜帶日幣的數額，升八年七月一日限制爲五百元，對百圓的大票携出概許可制，同時又抑制上海日本銀行方面的貸出，獎勵購買愛國公債和貯蓄等。至同年七月五日以後，在上海的各日本銀行支付日幣

五百圓以上者，均採申請制，九月一日限額減至三百圓，十月二日更降止五十圓，廿六日以後，所有日資銀行如不得駐滬財務事務所的許可一律禁付日幣。至念八年十二月一日以後，除滿蒙旅行者以外，銀行不得支付日幣，念九年一月一日以後，銀行收受日幣時，須附駐滬財務事務所的許可證。又規定至昭和十四年（民念八年）十二月一日以後，在華中從來用日幣支付的結賬，應改用軍票，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截止，凡持有日幣者，應向銀行兌換軍票，於是軍票就取日幣之地位而代之。

在這種「統一軍票」的強化過程中，遂造成了一個非常奇形的現象。

即在初期，日圓紙幣是處於完全放任的狀態，現在因了所謂「統一軍票政策」，日幣是採取了可以統制的軍票形式，性質有根本的不同，因為敵人爲要維持其在華僑民的生計和「消化淪陷」區計，就必然的謀堵養其軍票如普通貨幣的國內通貨機能。但是因爲日幣的黑市交易並未斷絕，於是另一方面日本國內的日幣因欲逃避其國內實施的外匯政策，大都暗中通過上海黑市而向第三國輸出，也有一般日本商人，通過上海黑市而獲得，其在本國內絕對不能獲得的進口外匯，同時另一方面。在上海少數的日幣也有爲了逃避軍票的統制而將日幣暗中輸入日本，這情形常被敵方官憲等發現，此外還有一般留居上海，回國的敵方人民和赴日本旅行的第三國人士，無不都以上海賤價購得的日幣充其旅費，以及一般匯往日本的款項也都經由上海轉匯。

再就軍票與偽幣的關係說：軍票的存在，它對於偽幣發展的阻礙大於其對法幣的打擊，先就過去之「華興券」

因爲軍票與「華興券」同時在同一地域流通，二者並沒有在我華中淪陷區內劃定其各自的流通範圍，而且相反的，在某種程度內，敵人的軍用票對偽幣還起一種監視漢奸的觸發作用，這對於「華興券」是個致命打擊！

「華興券」發行之初，軍票早已流通。而軍票是敵人在華軍費的重要支點。爲了維持軍票的價格，有許多是「華興券」預定的流通區域，或「華興券」易於發展的地域，都不能不讓給軍票，例如在淪陷區採購出口商品的原料，本可以利用「華興券」的，可是實際却用的是軍票，有大部分的敵僑僱給工資也是如此，購物用「華興券」作價的，只有一種鹽，關稅雖改收「華興券」，但實際收入的仍是法幣，有人批評說「華興券」是以單純的貿易通貨出發而不兼備「國內通貨」的機能，這從敵僑利用我法幣的信用藉以擴展其流通範圍上說，這是根本的錯誤，但這個錯誤當初確是爲了避免「華興券」對軍票的磨擦而生的。

其次，再說到軍票與「中儲券」的關係，兩者因也在同一地域流通，所以「中儲券」命運的遭遇，也一如運

去的「華興券」

軍票的發行額據 COMMERCE AND FINANCE 的估計軍票在華中流通者約達一萬二千萬元，在華南流通者約計五千萬元，兩共約計一萬七千萬元。但另據美國商務參贊之報告，約有六萬萬元之巨。而「中儲券」的發行至去年底，據敵大藏省公佈「圓系通貨」的數字，計有二二一九二四千元，如果據後者軍票數字的比較，則幾超過「中儲券」的三倍，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儲券」要得到發育成長的機會是很困難的。

宮下忠雄對於「中儲券」的前途，也認為有兩種通貨限制着「新法幣」(——即中儲券)的發展，即除了我法幣之外，就是軍票，然而他雖明知如此，但也提不出一個澈底的解決辦法。

曾有一個為汪逆所同意的辦法，載於東洋經濟一九五五號里，他說：

「這個困難不解決的話，(印指軍票與「中儲券」的矛盾——筆者)新法幣(——即中儲券)非但不能成爲中日協力的紐帶，反將成爲紛爭的種子，弄到雙方都進退維谷，如欲消解此癥結，速以新法幣收回現行軍票，將來在軍軍費之支出，一概改用新法幣。當然軍費支出不能全部由「新政府」負擔，應由日本在國內或上海，爲「新中央銀行」(——即汪逆之偽中央儲備銀行)設一定數額之日圓準備金，由「新中央銀行」發行紙幣，而向之借支，即將「新法幣」與軍票，爲一合體，如此雙方俱不增加負擔，而可形成一強有力之新通貨。」

敵人以物資支持其軍票價格，但因其本國內物資的缺乏，又受「物動計劃」的限制，自知今後輸入淪陷區的物品勢將減少，如欲以較少的物資而收回等額之軍票，結局只有提高物價，故不如以所謂「新法幣」收回現行的軍票爲妙。

但是敵人之所以沒有實行這個辦法，至少有下列幾點原因：

第一，最主要的是敵人本身利益超過淪陷區物價的昂高，縱而在某種程度上，也超過其所謂「消化淪陷區」的陰謀，目前敵人非但華中日貨輸入乃以軍票爲支付手段，且在滬組織日本進出口商人會社，以圖統制上海與其相近之佔領區的貿易。規定凡內地輸進上海之土貨及上海貨品(不論它是洋貨或日貨)之輸入佔領區內，均須以軍票爲收付，其由會社統制貨品在佔領區地內之批發或另售等亦然。依此趨勢敵人頗有將軍票造成未來華中「法幣」的企圖與野心。

第二、自太平洋戰事發生以後，敵人處境日趨困難，因而對淪陷區的控制，也處處有「借重」汪逆的地方，汪逆抓住敵人這個弱點，於是在經濟上向敵人提出了許多要求：有改組「國策會社」重新估定中日經濟合作條件的要

求；有發還全部「軍管工廠」的要求。在幣制上有用「中儲券」收回軍票的要求。

汪逆在「中儲」未成立之先，就希望用「中儲券」來統一軍票與其他各種偽幣的。

汪逆在「中儲」未成立之先，就希望用「中儲券」來統一軍票與其他各種偽幣的。在民國二十八年秋，汪方初創設立「新中央銀行」發行「新法幣」以收回軍票之時，即遭當時平詔時代之石渡藏相堅決反對而未成議。

今日之再渡提出是項要求，在汪逆是想藉此時機，衝破這層困難，如敵方有誠意允其用「中儲券」收回軍票，則對華北之所有偽幣可以迎刃而解，而「中儲券」之流通範圍也將因此而由蘇浙皖三角地一偶伸張至華北各地。這是汪逆對付華北偽組織的一種陰謀手段，可是這一點在原則上是與敵人「分清政策」與「以偽制偽」的陰謀有所抵觸，因而在敵人也不能不對這一點有所顧及。

同時另一方面，軍票給予法幣最大的威脅，便是敵人爲的提高其價格，加以奸商們利用漢口與上海二地軍票價格的差額，以軍票爲投機手段，助波興浪，造成太平洋戰前法幣四元換取軍票一圓之高紀錄，但是真正實際支持軍票的價格者，是敵人國內大量輸入淪陷區的物資，以及此外在敵人控制下的交通機構，可是要依賴日本國內對淪陷區大量輸送其纖維工業品來支持軍票這一點，在現階段日本資本主義是搖頭的，一般說來是一個難題。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國內因軍事需要增強，和平工業相對削弱，軍事上雖在太平洋獲得若干局部勝利，但所佔之地，所有資源均經當地守軍悉數破壞。而國內工業所依賴的市場和原料供給反因而失去。據「東洋經濟新報社」的統計，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日本纖維工業的生產指數爲一〇〇，至一九三七年平均指數增至一四〇，可是到了一九三九年七月便降落到一三二，再到一九四〇年的一月份，帝國纖維工業的生產指數僅存一〇二了。筆者很遺憾不能找到更新鮮的數字，來作更有力的證明。爲了彌補這個遺憾，筆者在這里促諸讀者注意一件事實，即淪陷區里的物價，這種資料各位可以在報章什誌上看到各地通訊，它會告訴你，目前在那里百物正在飛漲中。這替我們證明了什麼呢？它正說明，敵偽物資缺乏的程度，作爲軍票的「準備金」之物資既已如此，則得以此支持的軍票信用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敵國帝大教授，曾極力主張緩和限制對日圓集團的輸出，曾說只要有物資便可「屈服」重慶？敵寇人爲的提高軍票價格；這對敵偽本身的影响並不完全有利的，據敵人去年自己在四月一日讀賣新聞的社論上指出說：

「華中方面現今的法幣問題，其性質和過去已大不相同。過去法幣的下跌，是對外的一般下跌，今則法幣對軍票雖慘跌，對英美則未有如何的看衰。法幣對軍票，過去大致保持六七十圓的程度，自三月廿四五日起軒然大波，

一氣退進五十圓關。且有迫進四十圓關之勢。而法幣對英美的匯價，還是穩定於三鎊士餘及五金元餘，故此問題。與其說是法幣的問題，寧是軍票的問題。

敵人以軍票為徵發我國人力物力的緊急手段，那末軍票價格的抬高是對敵人有利的，因為敵人可以藉此徵發較多的物資與勞力。敵人也常以此作其宣傳軍票政策的成功。但是作為一種普通通貨的機能對內流通，即對淪陷區的流通過程中，於法幣同樣在淪陷區並行流通的目的，軍票價格的抬高，則對於敵偽是沒有好處的，尤其是在「消化淪陷區」這一陰謀上。

作為徵發手段與普通通貨機能對淪陷區流通的軍票，因為這兩者不能機械的分離，所以軍票價格的抬高，大之可使中日物資交流不能活潑進行，使中國人的資本不能活潑運用。小之，能在這影響下使「和平區」的物價吊高，為了挽救這個矛盾，去年敵人會自動壓低了軍票價格。

但至去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事爆發，滬港相繼淪陷，過去之自由市場已消失了它的自由，從而法幣的最後根據地亦顯着失去，另一方面敵人的許多套匯技術，也同時跟着失去其用武之地。

於是敵人復又提高軍票偽幣對法幣的交換比率，藉以排斥法幣，在此種影響之下，淪陷區內之我國受難民衆，紛紛向我方控制下的陰陽界內，用法幣爭購貨物。敵人此舉雖有違其本身。欲「消化淪陷區」的陰謀，但在其與整個「軍票政策」與「偽幣政策」之主要目的的比重下，不得不毅然實行。

為抵抗計，今後法幣的出路，筆者在「論太平洋戰事爆發後的對敵經濟戰」一文中：指出資金逃避之門已關，過去政府在外交上對英美在華之商業利益之顧及今已可不必，故建議法幣應大量流向淪陷區，建立經濟游擊根據地設立游擊區內可流動之小型工廠，用法幣向淪陷區購買原料，也會預言敵偽將要排斥我法幣。今日不幸此言固已實現。

遂後我財部雖有「銀錢行號政軍機關運送法幣或商旗攜帶法幣往來國內或出口者一律不加限制，並免予請領護照」的規定。

——摘自本年二月六日民族日報——

但事變之嚴重，決非一紙通令所能挽回，今後非有真正執行對敵經濟鬥爭者不為功，此舉成敗，有關我抗建者大矣，深盼我賢明當局，積極推行！

偽「東亞聯盟」運動之本質

(一)自中日戰事爆發以來，敵國野心政治家與御用文人，製造了許多亡華謬論，如「東亞協同體」「東亞聯邦論」等都是；「東亞聯盟論」不過是其中的一種。此「東亞聯盟論」在本質上與其他謬說相同，均係導源於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三日敵國首相近衛之聲明。

(二)此謬論的對我鬥爭的意義，在於其企圖由對「東亞」這一概念的強調，陰謀以取消我國人的民族意識。四年來隨敵我鬥爭形勢的演變，此謬論會經過如下的發展：

在開始時，敵人的目的在於掩飾其對我戰爭的侵略的性質，並陰謀藉此以助長我內部的「和平」分子的氣焰，最近衛力言其對我戰爭的目的，並非要滅亡中國，不過是為求「東亞新秩序」之確立，即中日「滿」的相互提攜，——這就是敵人當時此項謬論核心。

到汪逆偽組織行將出現之時，敵人又有所謂「東亞全民主義」的提出（請參看本館出版之「敵偽研究叢書」第四種中「敵國御用學者論亞洲民族問題」一文）。其時他們着力於所謂「喚起東洋一體意識的覺醒」的宣傳，貽稱戰爭之發生，係由於中日二國缺乏東洋的自覺，和英美蘇聯的策動。坂垣征四郎之「告派遣軍將士書」，可謂這時期的代表文件。

到德國稱霸歐陸，敵國南進陰謀進行益亟之時，此「東亞聯盟」謬論，又來了一次改鑄，即由東亞自覺的宣傳進而「要求」東亞各民族和歐美敵對，宣傳我方完全做了英美在東亞的哨兵，並且汪逆及其他各地漢奸提出了一分「重建東亞新秩序」的要求，還與敵人欲以「凍結事變」來減輕其自身對於對我戰事負擔而便其實行南進的陰謀，完全一致。

太平洋戰事發生後，此謬論到目前還看不出有什麼新的修正，不過是將上述各點格外加以強調而已。其稱太平洋戰爭為「大東亞戰爭」，於其攻佔香港、新加坡之時，令各地奸偽大事慶祝等等，都是為了陰謀使我淪陷區民衆仇視英美，引起其「東亞的自覺」，否定抗戰，助其敵對英美。

(三)「東亞聯盟」運動的出現，在敵國內要比在我淪陷區早。廿八年秋，這運動的宣傳在日本開始普遍展開，一年之間，日本各地府縣都有了東亞聯盟協會的出現，奸偽之有此運動，則始於二十九年，起初是由北方的謬

逆斌等主持其事，北京的偽中國東亞聯盟協會，是奸偽所主持的此項賣國運動的最早出現的團體。其次，華南漢奸們，於同年九月中旬，也在廣州組織了同樣的偽會。汪派嫡屬參與此項賣國運動，實較北京和廣州為遲，（南京偽東亞聯盟中國同志會之結成，係在前年十一月間），然因為敵人「奸偽一條鞭」政策的執行，汪派遂後來居上，掌握了此運動的領導權，而以其建立一黨中心勢力，控制其他派系漢奸的工具；前年十二月中旬偽大民會、共黨、興建本部，均被迫而自認「因願分從東亞聯盟運動而消解」。至去年二月一日偽東亞聯盟中國總會出現以後，汪逆又自為會長，各地舊有的偽東亞聯盟協會，均被改組為分會，隸屬於偽總會之下。

（四）偽東亞聯盟運動的綱領，在日本是如下三者相標榜，此即：國防共同、經濟共通、政治獨立。到汪派手裏，這三條綱領變為如下的四條：政治獨立、經濟合作、軍事同盟和文化溝通。其實這二種綱領在性質上和內容上並無不同之處。敵汪的互異之處，是在於：敵人高唱「東亞聯盟」的目的，是陰謀以此消滅我國人的抗日意識；汪派漢奸之響應「東亞聯盟」運動，就其對敵人的關係上言，除了替敵人效忠以外，還企圖由此自敵人那裏爭得更多的「自由」和「權力」。這也是汪逆的政治性格。因此，汪派漢奸特別強調所謂「政治獨立」，而他們對於「經濟合作」和「軍事同盟」的解釋，也和敵人有了不同之處。他們一方面要求敵人勿多干涉其偽組織的內部，要求許其統一羣奸而受其支配，由「對內統一」的完成而被承認為較有獨立性格的「聯盟」的對手，方用「統制」的方法來指導，東亞聯盟，不會發生效果的，同時受了統制，聯盟的一部份，必成爲不自由，不自由的部分，必定脫退聯盟。（汪逆語）。——這充分顯露了汪派漢奸的政治要求。因此，敵國內部，也有了「東亞聯盟的平等結合，忘卻了日本國的指導性」的呼聲了。

（五）汪派於運用「東亞聯盟運動」企圖由敵人手中爭得更大的「權力」外，還陰謀由「東亞聯盟運動」領導權的掌握與運用，而建立其所謂「一黨中心勢力」和「統一」偽國民運動。關於前者，以偽大民會等的解散最爲明顯，上文已有述及。至於其「統一」偽國民運動的陰謀，在林逆柏生「關於東亞聯盟運動」一文中，已說得很明顯（見所附參考資料），他率直地說這是「國民黨爲中心而發動之國民運動」。所以這同時成爲汪派爲其他派系漢奸矛盾的焦點之一。

附 參考資料

東亞聯盟運動之展開

三木祐三作

新中國的問題，無論是對內或對外，一種中心勢力的獨立是必要的，同時爲着展開全國的和平運動，使全民族的抗日心理轉向於親日，也是絕對實在南京確立統一的政治勢力之必要。

因此，自去年三月國民政府還都以來以國民黨員爲中心所展開的東亞聯盟運動，是在十一月三十日與日滿兩國恢復國交，同時急速地成爲具體化的，一方面以十二月十五日在南京舉行的國民黨三中全會爲契機，進而推動了全國的國民運動，這是在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的指導下，以幾百個革新青年爲中心，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南京所組織的東亞聯盟中國同志會，認爲東亞聯盟運動乃結集政治中心勢力之基本組織，故對興亞建國運動與大民會，促其合流，而這兩個團體，亦共鳴於此主張，於十二月十七日，各發表其解散宣言，遂合流於東亞聯盟之總匯。

另一方面，以何佩瑛爲總裁的武漢共和黨，亦頗分袒東亞聯盟運動之一翼，並決意加入於國民黨，該黨於十二月十八日在武漢開黨大會，正式發表解散宣言，黨

員四萬餘人，全體合流於國民黨。

如上所述，因興亞建國運動及大民會，向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作發展的解消，及武漢共和黨之合流於國民黨，於是南京國民政府所擔導的民衆運動，遂與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成爲一元化，在政治上是被統一於國民黨的中心的。

日本方面亦適應中國這樣的趨勢，展開着強力的東亞聯盟運動，東京已成立有東亞聯盟協會，關於東亞聯盟理論，主張應在中日滿三國之上，組織東亞聯盟機關，三國隸屬於那超國家的機關，而行使其國家權力，一月十四日在日本政府定例的閣議上，這個主張成了問題，隨建設大東亞新秩序，決定了指導理念的具體方向，公開發表如下。

以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爲目標的各團體行動，應依照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十一月三十日中日滿共聯宣言所闡明的旨趣，如違反肇國精神，使皇國主權有啞冥之處的國家，聯合理念等，當不許其存在，關於帝國內部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思想運動，使大政覽覽會負其責任。

這是明確承認，抽象的國家聯合理論，是與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相矛盾的，但在南京所展開的東亞聯盟運

動，是與此全無異其性質，而出發於近衛聲明的東亞聯盟思想，所以日本方面對此，自然是不惜予以全力的協力的，然而閣議所決定的事項，因為新聞記者等的曲解，影響於中國方面亦着實不少。

對於走着正軌的東亞聯盟運動，日本是被誤解有壓抑之勢的，所以雖傳說着日本對於中國之該運動，將積極加以支持，但重要的日本既然如此，其前途自然可知——抱着這樣悲觀的人，也許是不少的吧。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的同志，曾強調說過，東亞聯盟不只是中國一國的問題，我們應該使中日滿三國的步調，邁進於這個運動，中日已經被迫於不能不通過東亞聯盟一致協力以抵當西歐帝國主義的侵略了，日本若不支持東亞聯盟，中國東亞聯盟運動的意義是很少的，而其發展也是沒有希望的。

關於這一點，日本方面同志的說明是，日本當局現在正以太政翼贊會為唯一的國內的運動而展開的時候，所以暫時撇開其他的運動，但這並不是反對東亞聯盟的中心思想，即使現在不能容納那種思想，那也止於一部份而已，所謂日本方面的反對論，主要的是因為強解而發生的。

所以為着要更具體的展開中國的東亞聯盟運動，而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便於二月一日在南京成立了，去年十一月所結成的東亞聯盟中國同志會，已為該總會所吸收，今後中國的聯盟運動，當然是以這個總會為中心而展

開的。

前在大政翼贊會的統轄下漸見進展的日本東亞聯盟運動與這個總會之間，應該發生怎樣的關係，還是一個問題，但基礎尚未鞏固的中國聯盟運動，自然是應該站在日本聯盟運動的指導下的。

東亞聯盟運動給與中國人第一個魅力，顯然是在於中國的獨立和平等的立場，中國人抗日心理的強烈，是出於國民要求自由與獨立而來，所以東亞聯盟的指導方法，不能不採用民衆的愛自由與愛獨立的精神，為兄弟的前進的日本，帶着具有自由獨立精神的中國老弟活潑的前進，那裏才可以發現共存共榮，同心協力的精神。

今日世界的形勢，是一天一天向着大戰前進的，任何國家者絕對不能保持孤立的存在了，歷史和文化比較緊密而且同其利害的國家，是不能不以相互集團的行動而圖彼我的安全和發達的，尤其是歐戰勃發以來，幾個國家集合共謀建設世界新秩序的傾向，更加顯著，所以關於建設東亞新秩序，以有共同歷史使命的中日兩國結成樞軸，增進兩國的福利，保障東亞的和平，是當然的。

東亞各民族，百年來因為呻吟於歐美帝國資本主義殘酷的桎梏之下，東亞民族的發展被阻，東方文化有被歐美物質文明滅亡的形勢，為着解放民族，復興東方文化，中日兩民族互相攜手，擺脫歐美帝國主義羅網的時期，就在目前了。

東亞聯盟運動四大綱領的政治獨立，經濟合作，軍事同盟，文化溝通，一方面在確保東亞民族獨立的本質，同時在另一方面，可以獲得互相援助的效果，兩國國交的調整，自然是以中日滿的共同宣言為基準的。

四大綱領之一所明示的所謂政治獨立，並不外是在於促進東亞各民族的團結和互相協力而已。

中日兩國的共同共榮，因為東亞聯盟運動的開展，可以得到合理的保障。

戰後新中國的建設與東亞的復興，是有待於愛東亞愛中國的和平鬥士的推進，而達到東亞聯盟運動之目的。

關於東亞聯盟運動

林柏生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經愛國家愛東亞之和平鬥士之推動，在繼承創行大亞洲主義之孫先生之遺志之汪先生領導之下，已於本日成立於首都。各方人士，對於本會之性質及其宗旨，深願得知其詳，茲就近頃中外記者所提出諸問題，分別剖釋如左：

(問)：請問東亞聯盟運動之中心思想，從何出發

(答)：東亞聯盟運動，雖至今始有具體之進行，而其中心思想，實淵源於孫先生革命主張之整個的理論體系。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欲達到此目的，不惟要喚起民衆，努力革命，並且要聯合世界

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中日兩國同處於東亞，同受歐美侵略勢力之壓迫，亦即同具有復興東亞之責任，孫先生在首創革命之始，早已抱定此見，即在初期革命文獻中，隨處都已透露着這種主張。舉例來說，民國前三年，汪先生在「申論革命決不致召瓜分之禍」一文，便已說過：「凡一國立於世界，必與他國有利害關係，其利害相反者，則常存仇敵之心，其利害相同者，則常存聯結之心。：：：一國不能孤立於世界，必連合利害相同之國，然後能制人而不爲人所制。」又說：「國之所以求同盟，欲其相助也，個人者已無自存之能力，何能助人，人亦何樂乎其爲助。」同文更就東亞之局勢，申言中日利害相同，有聯結之必要。既慨乎日方保全派與侵略派所見各異，尤慨乎中國不能自立，無以解侵略之憂，所責於本國的至深，所望於日本的亦至切。民國六年，在孫先生授意朱執信先生筆述「中國存亡問題」一書中，復明白指出：「日本與中國之關係，實爲存亡安危兩相關聯者，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中國與日本，以亞洲主義開闢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國亦以其門羅主義統治太平洋以東之勢力，各趁其生長，百歲無衝突之虞，而於將來更以此三國之協力，銷兵解仇，謀世界永久之和平，不特中國蒙其福也。」至十三年間，孫先生於講述三民主義之後，特地繞道日本北上，具體的提倡大亞洲主義，以促東方兩大民族之自覺，以三民主義爲建設新中國之指導原理，以

亞洲主義爲建設新東亞之指導原理。一則曰：「在亞洲東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國與日本，中國同日本，就是這種運動（民族獨立運動）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發生了結果之後，我們中國人此刻不知道，你們日本人此刻也是不知道，所以中國同日本現在還沒有大聯絡，將來潮流所趨，我們在亞洲東方的各民族，也是一定要聯絡的。」再則曰：「我們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結果，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呢？就是爲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樣才可以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要爲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問題。」由此可知孫先生之革命主張，不備爲中國一國着想，同時爲整個東亞着想，此實爲東亞聯盟中心思想之歷史的根源。其在日本自甲午戰爭以來，同憂其眼之士，亦不斷的有過類似的主張，雖動機論點未必盡同，然中日聯合共保東亞，實在是兩國共同的需要，不備爲論理上所當然，抑且爲事實上所必然。只以形格勢禁，遂至背道而馳，直至此大事變於痛苦犧牲之餘，從血泊中激發了兩國國民對東亞之自覺，因而有和平運動之誕生，因而有中日條約之簽訂，因而有共同宣言之發表。我們今日亦即本於向來對中國對東亞之革命的信念，進而爲東亞聯盟之運動。會章前文，於寥寥數十字中，宣示本會創立之旨趣，第一點，指出大亞洲主義是東亞聯盟運動之指導原理，第二點，指出東亞聯盟運動是共同宣言之具體實行，第三點，指出共存共榮復興東亞是東亞聯盟運動之共同目的，言簡而

意賅，東亞聯盟運動之中心思想悉具於此。

（問）：基於上述中心思想而展開之東亞聯盟運動，其性質如何？願聞一二。

（答）：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之創立，在把握時局之進展，適應國民之需要，而策動偉大之東亞聯盟運動。此運動有如下之特質：（一）爲以國民黨爲中心而發動之國民運動。（二）爲以大亞洲主義爲指導原理，以共同宣言爲基本精神，以東亞聯盟爲具體方案之思想運動。（三）爲（就中國之本位，聯結日本成爲軸心）喚起東亞各大民族建設民族協力共存之新體系之國際運動。

（問）：東亞聯盟運動之中心思想，及其特質，既如上述，然則本會是否是一種政黨的結合呢？

（答）：不是的。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不是一個政黨，而是以黨爲中心，聯合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之人士而推動之國民組織。中國今日對內對外，最迫切需要的，無過於中心勢力之樹立。此次運動發展之結果，無疑的將增厚和強化中心勢力的基礎，但它是黨的外延，而不是黨的代替。

（問）：又是否是一般民衆組織的代替呢？

（答）：也不是的。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不是帶有階級性或階級聯合性的職工組合，而是喚起全民聯合東亞各民族共同奮鬥之策動機構。在橫的方面，他應該透過各階層的職工組合，在縱的方面，他不能代替了各階層的職工組合。

(問)：會章第一條明定東亞聯盟之四大綱領，一為政治獨立，二為經濟合作，三為軍事同盟，四為文化溝通，此四點為近衛聲明，主席電及共同宣言之精髓，亦為復興東亞必備的要件，無可疑義，然在具體實行上，所謂聯盟，將是怎樣一個形式呢？

(答)：我們所當注意是精神，不是形式。就政治獨立而言，東亞各民族國家互相尊重其獨立之生存，以為互相協助之結合，所以東亞聯盟，可以說是一種民族的聯盟。就經濟合作而言，東亞各民族國家，基於有無相通長短相補之旨，確立平等互惠之經濟聯繫，所以東亞聯盟，又可說是一種經濟的聯盟。就軍事同盟而言，東亞各民族國家，以軍事上之分工合作，謀安危相關之共同防衛，所以東亞聯盟，又可說是一種軍事的聯盟，就文化溝通而言，東亞各民族國家，本於東亞本位文化之立場，對東亞謀彼此文化之融合，對世界求東亞文化之發揚，所以東亞聯盟，又可說是一種文化的聯盟。

孫先生說過：「我們中國國民，想同日本國民聯絡一氣，用兩國國民的力量，共同維持東亞大局。」(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海丸中與神戶新聞記者之談話)又說：「日本幫助中國，中國國民真是感激日本，中日兩國，便可以合作互助，另外再立互助的條約，像經濟同盟，和攻守同盟，那些互助的條約，都可以再定，假若中日兩國真正做到攻守同盟，日本所得的權利，當然比現在所享的權利大過好幾百倍。」(同上)又說

：「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為基礎，是為打不平，：：：我們現在所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衆平等解放的文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我們今日所謂聯盟，正是這個意思，只要東亞各大民族守着上述的精神，為共同目的而共同奮鬥，則誠如孫先生所說：「聯絡兩國國民的方法，是很多的。」至於有人以東亞聯盟，比擬國際聯盟，又有人以東亞聯盟為一種超國家的權力機關，前者是軟弱無能的虛構，後者有損政治獨立的主權，皆非所取。重複說一句，我們現在所當注意的，還是重在精神，不在形式。

偽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會章

本會同人為謀實現孫先生之大亞洲主義期與鄰邦各本於自由獨立之立場依最近共同宣言之精神建設以道義為基礎之新秩序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並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講求互助敦睦之手段以達到共存共榮復興東亞之共同目的爰創立斯會定名為東亞聯盟中國總會其會章如左：

第一條 東亞聯盟之綱領如左：

- 一、政治獨立
- 二、經濟合作
- 三、軍事同盟
- 四、文化溝通

第二條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以下簡稱本會）以促進

東亞聯盟之實現及其綱領之實行爲宗旨

第三條 凡中華民國國民志願接受本會宗旨請求入會

經本會許可者不分別性別得爲本會會員

第四條 本會設會長一人由創立會推定之

第五條 本會於會長之下設理事會爲執行機關設監事

會爲監察機關

第六條 理事會除當然常務理事及當然理事外設理事

三十六人至四十八人就中以七人至九人爲常

務理事其名單均由會長於創立會提出通過之

以後如增設理事由會長於理事會提出通過之

第七條 本會設於首都各省市得視實際之需要設立分

會

第八條 本會理事會下分設秘書處及左列各委員會：

一、秘書處

二、指導委員會

三、宣傳委員會

四、文化委員會

五、社會福利委員會

第九條 本會隨事務之擴展得由會長提出理事會議決

增設委員會

第十條 秘書處設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二人各委員會

各設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二人委員七人

至十一人均由會長指派之

第十一條

秘書長及各委員會主任爲當然常務理事副秘

書長及各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爲當然理事

監事會除當然常務監事當然監事外設監事三

第十二條

十三人至四十七人就中以五人至七人爲常務

監事其名單均由會長於創立會提出通過之

第十三條

以後如增設監事由會長於監事會提出通過之

第十四條

監事會設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二人均由會長

指派之

第十五條

秘書長爲當然常務監事副秘書長爲當然監事

第十六條

理事會監事會及理事所屬各處會組織規程另

第十七條

定之

第十八條

各省市分會設理事若干人就中以五人至七人

爲常務理事監事若干人就中以三人至五人爲

常務監事均由本會理事會承會長之命指派之

僑東亞聯盟中國總會重要職員

會長 汪兆銘

常務理事

陳公博 溫宗堯 陳肇君 陳 羣 徐 良 諸青

來 趙毓松

理事

曾醒 任樓道 戴英夫 石星川 焦

登 陳春圃 夏奇峯 趙正平 羅君強 陳季木

樊仲雲 蔡培 汪曼雲 馮節 葉蓬 高冠

吾 陳耀祖 林汝琯 李聖五 傅式說 李士羣

岑穆廣 陳君慧 蕭叔宜 湯良禮 金家鳳 蔡洪

田 胡澤吾 凌憲文 馬嘯天 沈爾喬 張仲寰

戴 策 張君衡 孫鳴歧 陳嘉霸 林朝暉 陳顯

譚 鄭洗熹 張超 黃大中

理事會秘書長 周佛海

副秘書長 馬學昌 周蔭序

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梅思平

副主任委員 李祖虞 王敏中

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 林柏生

副主任委員 周化人 袁殊

文化委員會主任委員 彭斌

副主任委員 金雄白 何庭流

社會福利委員會主任委員 丁默村

副主任委員 彭年 孔憲經

常務理事

梁鴻志 褚民誼 江亢虎 顧忠琛 張永福 徐蘇

中 何佩琿

監事

溥 侗 楊壽楣 廉 隅 張 翰 陳濟成 林

彪 劉郁芬 何炳賢 王熙和 李守愚 顧繼武

倪道揅 胡蘭成 廖家楠 吳凱聲 湯澄波 黃香

谷 伍澄宇 梅哲之 楊揆一 加拉利丁 克興額

陳允文 顧寶銜 蘇成德 唐啓元 唐惠民 陳伯

審 張顯之 翦建午 劉雲 凌 霄 朱 樸

黎世銜 陳之頌 趙世鈺 楊 傑 莫國康 艾魯

韓潛健

監事會秘書長 朱復解

副秘書長 劉仰山 趙叔雅

敵「強化」汪偽之檢討

「強化」汪逆偽組織問題，早為敵國侵略家及一般御用學者所集中討論，豈日本欲利用汪逆以達到佔領地區全而的「統治」，則必先育成偽政體，以消滅我民族意識。自二十九年三月杪汪逆偽組織出現以來，七月初旬開始所謂「汪阿談判」，中間經過四個月之長時期談判，表示敵人扶植汪逆的陰謀，初僅希望利用汪逆以對我進行和平攻勢，企圖使我抗戰生變，及至其陰謀為我堅持抗戰所粉碎，乃於十一月三十日簽訂所謂「中日調停國交條約」，聲明相互尊重主權、領土、政治、經濟、文化請求互助提攜，並商定隨中日新關係之發展，日本應撤廢治外法權與交還租界，以及交還由日軍當局所管理之礦山、工廠等。偽約成立後，汪逆即揭示「政治獨立」、「經濟合作」、「軍事同盟」、「文化溝通」之高調；十二月十五日偽黨召開「三中全會」，翌日，偽興亞建國本部即宣言解散，十七日，偽大民會併入偽黨，十八日，武漢偽共和黨亦召開黨員大會，宣佈解散，全體黨員參加汪黨為黨員；十二月十六日及翌年（三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敵先後交還上海新聞檢查所及廣播權，其後，陸續發還若干軍管工廠。以上為敵人企圖使汪逆扮演淪陷區國民的代言人，不惜促成汪逆「一黨中心勢力」的樹立，由有成汪逆「統治」淪陷區的諸條件，以求得「解決中國事變」之實現。

但敵人以上的措置，雖似已有意「強化」汪逆，以作為其處理事變的必要途徑，然這僅限於政治的方面，於經濟方面則未予以放鬆。所謂發還軍管工廠，在敵人的用意，不過是欲以通過汪偽，藉圖誘致我民族資本，這使汪逆偽組織始終是一個弱體，而無法真正「強化」起來，也是汪逆最覺苦悶的事。此為敵人與汪逆間的基本矛盾。

敵挑動太平洋戰爭後，其將在我淪陷區作更進一步的榨取，以供其長期的消耗。如何加強其對我淪陷區的榨取，如何「強化」汪逆，自亦為其重心課題之一；汪逆當也必乘機承力爭取自身經濟力量的加強，「強化」其實力，並謀由經濟的爭取而確立其社會基礎。

然則現階段敵人「強化」汪逆可能的程度究如何？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概括言之，在政治上敵人是允許汪逆相當地統一各地偽組織，如偽臨時、維新政府與偽國府的合流，汪偽一黨中心勢力的樹立等，在經濟上，重要的產業部門和物資，敵人則自行直接控制；稅收方面，敵人大部份自行直接徵用（指中央稅），也分一部份給各地偽組織，使其在對我們爭上取給必要的費用。同時并執行與其在政治的「統一奸偽」政策相度的陰謀，即對各地奸偽，在

經濟上仍維持其各自的獨立性；在軍事上，敵人更承力支持各派偽逆的武力，以救「以偽制偽」的效用。此外，在社會運動與教育文化上，因汪逆是一個具有現代政治眼光的漢奸，與過去偽臨時政府和偽維新政府之舊式漢奸迥然不同，所以在這一方面他對汪逆是比較放手，但遺亦祇限於宣傳方面，組織上的伸展，汪逆尚受到敵人的限制。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正式躍入世界大戰漩渦後，為支持長期作戰，除佔奪英美在我國產業與我在港滬的資金外，在其關於「強化」汪逆以求充分消化淪陷區的這一要求上，值得重視的，是敵汪的經濟關係，也就是敵人是是否允許汪逆建立其經濟基礎，使汪逆自有其運籌的能力，而達高度消化淪陷區的目的。

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可從下列兩方面求得之：

(一) 敵人經過四年半以上的長期戰爭後之國內經濟狀況是否許其有此「雅量」？

(二) 敵人是否真正有意「強化」汪逆，以達到如汪逆夢想中的所謂「政治獨立」「經濟合作」……？

敵人經過我四年餘的抗戰，尤其受英美經濟封鎖後，敵人的經濟確已到了不能支持的地步，所以其挑動太平洋戰爭，最重大目的即所謂突破封鎖陣勢，以圖挽救其行將窒息的經濟，一方面攫取英美在遠東資產以自用。故敵人佔據上海租界和香港後，滬港所有英美和我方的資金、物資和各種產業都為敵人軍事當局所管制，汪逆絲毫無法指使，敵人并且謀利用上述兩地的資產，以為消化淪陷區之資本。所以自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敵國在華的經濟機構盡力調整其經營方式，即原有各種輸入配給組合，急求當地自給經濟的實現，首先將從事生產的各種組合加以改組，以求擴充，其方針以不從日本吸收新資金資材為原則。輸出方面，預料今後華中對敵供給日益增大，其具體方案正在研討中，由以上敵人在華中經濟上的政策，足見敵國經濟枯竭的程度已達極點，今後對我淪陷區經濟上的依賴必更甚。前已論及，敵人欲高度利用我淪陷區之資金與物資，「強化」汪逆為其重要課題之一，俾汪逆能充分發揮其麻醉的效能。但自敵人佔奪上海租界後，敵人在其利用汪逆的經濟陰謀上已起着一個基本的變化，如過去敵人交還軍警工廠於偽組織，由偽組織交還原業主，這並非敵人真正有意「強化」汪逆的經濟力量，而是謀藉此以吸收我更多之民族資本，蓋敵人佔奪上海租界後，我民族資本已失去其自由，敵人的可用武裝力量迫其與之合作，敵人連佔上海租界以來，已嚴厲執行此等陰謀，故其利用汪逆以誘致我民族資本的作用已大為減輕。總括言之，因敵國內經濟的窮困，必須加強其在我淪陷區的直接掠奪，同時敵人已無須通過汪逆以吸取我民族資本，所以敵人在經濟上「強化」汪逆的可能已極微小。

其次，敵人欲加強對我淪陷區的榨取，以維持其長期的戰爭，是一定之事；其欲達到此要求，首先須「強化」

汪逆，也屬必然之事，經濟上既無可能，那麼究將採取何種方式，這問題的解答，應於敵人自身投入世界戰爭後對汪逆的要求中求之。敵首相東條於新加坡陷落慶祝會中會謂：「日本在大東亞戰爭的進行中，將以中國為「兵站」的地位」，所謂「兵站」者，即敵人在太平洋戰爭中，其人力與物力的補充，均將自我淪陷區取給。其取給的對象不外：（一）敵經我四年餘之抗戰，兵源已極感缺乏，此次太平洋上的閃擊，僅利用其對我尚未使用的海空軍，今後如進行澳、緬、印等大陸上的戰爭，現有的陸軍已不足應付，所以其兵力的補充必須仰給於我淪陷區。（二）國內糧食缺乏，外米的輸入，因戰爭狀態的存在與船舶全部供作軍運，依賴外米已不可能。敵在南洋未能全面的佔領，則搜括南洋產米地帶糧食的夢想無法實現，因此其軍糧也須自我淪陷區中獲得。（三）佔敵國經濟上最重要部門的纖維工業，其原料完全仰給於北美、印度、北非，以上三地今均已成日本之敵國，敵人投身於世界大戰中雖當亟力強化軍需生產，但不能完全置那於國民經濟中佔着首要地位的棉織工業於不顧。如敵閩果可置國民利益而不顧，而機器之改裝亦成爲一絕大之問題，且棉花又爲炸藥原料，以及裁製軍士服裝等，在軍事上亦屬必需品，目前敵人在南洋所佔領各地並非產棉區域，印度之棉一時尙難得手，其唯一方法，當祇有加緊在我淪陷區的掠奪。敵自發動太平洋戰爭後，所謂資材集中於重要產業，其意即在於此。

敵人在太平洋戰爭中對汪逆的要求既如上，即可探知其「強化」汪逆所採取之途徑爲何如。其內容，當不出如下各點：

（一）竭力強調「東亞民族解放」。敵政府於本年二月十八日發表聲明交還廣州、天津兩地英租界，以提高汪逆的政治「威望」，俾遂其使我淪陷區民衆願供其驅役的陰謀。

（二）經濟上「強化」汪逆的金融機構，提高偽幣的價格，排斥我法幣在淪陷區的流通，以加強汪逆的「財政基礎」。以敵人的要求上言，其「強化」偽幣，即陰謀通過偽幣而得麻醉民心，以達高度榨取的效能。

（三）加強汪逆的「一黨中心勢力」，消弭各派奸偽間的矛盾，藉以免除因各派奸偽間的暗鬥而阻礙敵人對「淪陷區」的要求。

（四）協助汪逆加強「清鄉」，完成汪逆的「政治一元化」，並以建設性的促進農業生產，以達到在我淪陷區的「全面消化」。

（五）在橫的方面，准許汪逆的勢力伸展至華南、華北、武漢等偽組織的勢力範圍。配合上述敵人的要求，所以自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汪逆偽組織即召開所謂首腦部會議，決定集中全力於：

(一) 節約物的消費，努力擴充生產；

(二) 以揮脫英美的思想，指導民衆，積極展開民衆運動；

(三) 利用機會對我進行和平攻勢，促進華僑工作，增進軍事實力。

以上陰謀爲以所謂「新國民運動」爲基幹，詭譎大亞細亞主義，勵行節約，與「友邦」（指敵國）同甘共苦，作爲民衆運動的指導中心。三月二日由偽行政院召開地方會議，各僑省主席及僑市長均出席，其會議目的，卽如汪逆於報告開會意義中所謂解決治安、食糧、物資三大問題。此外，並由偽江蘇省政府召集非清鄉區縣長會議，其意義均無非欲貫徹其主子所授予的使命，以供敵人達到所謂「兵站」的願望。

汪逆除忠順於其主子外，當亦乘機爭取其自身的「強化」，主要着眼的當然在於經濟。上海的經濟既已無法擔負，所以特集中目標於南洋的華僑，蓋華僑一向愛護祖國情緒極高，敵人如欲吸收大量的華僑資本參加其「東亞共榮圈」，以爲開發南洋之用，尙有待於通過汪逆的所謂「大亞細亞主義」的麻醉劑，汪逆看中敵人這一弱點，遂於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數日內即派親信人員分赴南洋各地活動，（詳情見本刊第三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敵僞陰謀的新發展」一文）以快速的姿態，謀取得爭取華僑經濟的優先地位。但敵人是否會讓汪逆實現其夢想，在敵人所謂整個「東亞共榮圈」的陰謀中，是毋待說明的。

總而言之，敵人根本不會真心「強化」汪逆，以使後日不易控制，所謂簽訂「調整國交條約」，以及如何協助強化「國民政府」等的戰術運用得如何巧妙，都不能脫去戰略產物的範疇。二十九年十一月卅日偽中日調整國交條約簽訂之日，敵特使阿部於簽字典禮完畢後所發表的談話中，所謂「此次協定之特殊性，卽爲在事變繼續中所締結，故協定之締結，不過爲事變處理劃一階段耳」，由此益可證明敵人的如何「強化」汪逆，僅爲處理事變中的必要手段，故決無在本質上予汪逆以「強化」的可能，汪逆的命運殆亦永遠被停留在奴隸的地位。

附 參考資料

敵交還粵津英租界聲明

日本政府聲明 大東亞戰爭發生後日軍當即接收廣州天津英租界，日政府頃已決定將該兩租界之行政權交還中國，十八日通達國民政府，日政府本日下午五時發表聲明書如次：大東亞戰爭發生，日軍當即進駐廣州，天津英租界，實行管理，頃已決定將該租界之行政權交還中國，今日通達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聲明 此次承友邦日本，將日本軍管轄下之廣東及天津英租界之行政權，移交與國府管理，誠使中國感無已，同時國民政府今後將與日本更進一步提攜，以期為東亞永久和平及建設新秩序努力。

——摘自二月十八日新申報

偽地方會議之意義

三月二日偽政院召開地方會議，汪逆報告召開會議

意義，大意謂：「去年元旦曾指出：（一）確立治安，（二）改善人民經濟生活，為施政之兩大目標，一年以來，各地方長官，本此方針，努力不懈，自東亞戰爭發生以後，此兩大工作之推進，更覺重要，目前最要之圖，端在盡其在我，就治安與經濟兩點，積極推進，日方對此，迭次表示，以最大之誠意，為最大之協力，所望各地方長官，共本既定方針，相與戮力，必能使時局策進，日益開展。此次會議，蓋即就（一）治安，（二）食糧，（三）物資，三大問題，集台中樞及地方關係長官，從長計議，以謀具體之解決與施行。中樞意見，經關係部會之詳細計劃與密議，訂為提案，復於上月廿八日行政院臨時會詳加以研討，為原則之通過，至詳細項目，則留待與會者之縝密討論。各地長官提案甚多，且見各位對三大問題，關懷之切，亦將一一付之審議，以期各就其經驗所得，與地方實情，推誠商討，俾能完成嚴密而可行之方案。」